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回忆录

ANSWER

对历史的回答

HISTORY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对历史的回答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著

刘津坤 黄晓健译

郭靖安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年·北京

ANSWER TO HISTORY

by

Mohammad Reza Shah Pahlavi

对历史的回答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6.5印张 字数 142(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统一书号: 11220·8 定价: 0.9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对历史的回答》是前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去世（1980年7月21日）前不久完成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作者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记述了统治伊朗达53年之久的巴列维王朝的建立、兴起、衰败、直至最后覆灭的过程。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从作者登基之前到其即位之后直至被迫出走这半个多世纪中伊朗的内政、外交、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作者还以相当的篇幅记叙了伊朗与美、苏的关系和矛盾以及他自己流亡期间的悲惨处境。本书于1980年在美国出版后，深得国际上研究伊朗问题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重视。

伊朗盛产石油，战略地位重要，长期以来是美、苏两霸激烈争夺的目标之一。巴列维国王倒台后几年来，伊朗局势的发展仍为举世瞩目。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伊朗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变化，了解这个曾经是美国在中东最强大的“宪兵”的巴列维王朝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被霍梅尼所领导的宗教势力推翻，以及近几年来伊朗事态演变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生前的政治观点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保留原书的本来面貌，我们未加删改。请读者注意鉴别和分析。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年8月

目 录

	页次
一. 我的流放	1
二. 过去的教训	29
三. 从强大到沉沦	34
四. 通向印度和石油的道路	38
五. 我的父亲	42
六. 年轻人	57
七. 摩萨台	75
八. 从石油时代到原子时代	91
九. 白色革命	99
十. 外交政策	132
十一. 不光彩的红黑同盟	146
十二. 从希望到绝望	182
十三. 恐怖	187
十四. 结束语	196

一、我的流放

1979年9月16日，我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这部书的第一稿，从没有想到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补充进去。完成这部作品的初稿如同和时间赛跑。前几个月，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瘤可能复发了。在伊朗我曾与它搏斗了6年而且看来它已暂时不再活动了。如果我仍留在墨西哥，那么每隔几天就得从休斯敦用飞机运来专用同位素为我治疗。由于不能最后确诊，为我治疗的墨西哥、法国、美国医生催促我到美国进行全面检查。这种检查只有在休斯敦或纽约的大医院里才能进行。

我不大愿意去。自从1979年1月我离开德黑兰，华盛顿对我去美国并不热情。但是，有一点美国人讲得很清楚：一旦我的生命有危险，我可以去美国治疗并得到帮助。这些保证最后一次是美国驻巴哈马群岛大使向我重申的，当时我认为巴哈马政府是在英国的压力下拒绝延长我的旅游签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居住。我不是那种人，非要去一个不欢迎我的地方。但是，我有权让我的孩子们在美国受教育，我也有权享受美国医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我在位时曾认为我与西方的联盟是建立在实力、忠诚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的。大概那种信任是用错了地方。

10月，由于病情太重我不能再犹豫了。我决定去纽约治疗。我的随从做了必要的准备，10月22日这一天，我穿过墨

西哥机场的跑道向等候的“海湾潮流”喷气机走去。美国驻墨西哥城的总领事等候在飞机旁准备办必要的入境文件。我注意到了他看见我时的那副惊讶神情。这不是那个他所想象的国王，那个被新闻界长期描绘的人权践踏者和人民的压迫者。十分清楚，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手续办完以后，我那为数很少的随行人员登上飞机。我们计划在劳德代尔堡停留办入境手续，然后直飞拉瓜迪亚机场，再从那里乘车前往纽约医院。我和我的随从希望能在佛罗里达办理入境手续，从而可以避免在纽约受到新闻界的缠扰和引起安全问题。

我离开伊朗已经9个月了，这是痛苦、震惊、失望和思考的9个月。当我看到我国发生的一切，我的心都要碎了。每天都得到有关暗杀、流血、处决以及友人和无辜人民死亡的消息。所有这些恐怖活动都是霍梅尼摧毁我在位37年里呕心沥血为我们民族奠定的社会结构的有计划行动。然而，从美国人权鼓吹者那里却听不到任何抗议的声音，相反，他们对我的“暴虐”统治却肆无忌惮地攻击！我想作出这样的评论是可悲的：美国、的确大部分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对国际道德采取了双重标准：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多么残忍和卑鄙，它都可以接受；而社会主义、温和主义和右翼政府的政策则不然。

在我流放的最初几个月中我特别感到惊讶，西方竟不能清楚地认识和理解苏联扩张主义的巨大野心。我作为克里姆林宫主子的邻居度过了我的整个成年，在40年里，我从未看到过俄国对于其政治目标有过任何动摇：不懈地为称霸世界而努力。莫斯科有时间，它可以等上50年，可以接受一、两步的后退，可以接受交易和调停，但是它决不忘记它的最终目标。我曾热衷于缓和与和解，但并非出于美国和欧洲政府

政策的那种软弱性和优柔寡断的立场。如果它们的政策不改变，3年之内，欧洲就可能“芬兰化”。西方只有从实力或者至少从均势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缓和才有意义。80年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年代。1983年，俄国将达到它力量的最高点，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将衰弱到它成为世界大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最低点。

当前，实力及其在世界地缘政治结构中的应用已不是政治分析的流行题材。现在，一些著名的理论家都轻蔑地把国家安全看作是国际讨论的关键问题的思想说成是“装煤港”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英国海军在各大洋为其船舶争到了装煤港的时候，世界是一个安全得多的地方。甚至在核对抗的导弹时代，常规力量仍是国家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实力必须包括国外基地和坚定的外国盟友。二者我都曾相信过。1968年，英国把它的军队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出之后，我就愉快地担负起保卫波斯湾的重任。为了履行我们的新责任，伊朗不得不成为第一流的、拥有自己的基地和设施，并且有能力保卫它们的军事强国。我相信，我们的美国和英国盟友会坚决支持这些努力。然而，我却多么错误地选择了 I 信任的对象！

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中，我确信西方国家政府会有某种打算，有某种庞大的设想或总的看法，在这个对自由世界的幸福和繁荣如此至关重要的地区，它们会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疯狂的仇外情绪。在我离开伊朗的最初几天里，我在阿斯旺考虑过这个问题并曾同萨达特总统讨论过。但是，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里先在埃及，后在摩洛哥发生的纷乱使我没有时间作出清晰的分析。

在离开伊朗之后不久，我曾打算去美国，但是，在摩洛哥

哥时我开始收到与政府有关系的美国朋友和来自卡特政府内部的奇怪而又扰人心绪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并不是不友好的，但却非常谨慎：或许眼下不是你来这里的最好时机；或许你还是晚一些时候再来为好；或许我们应该等等看。大约在我离开伊朗一个月之后，信息的口气变得热情一些，他们表示，如果我实在想来，我当然可以来美国。但是，我已不太想去了。我怎么能到一个败坏我事业的地方去呢？渐渐地，我开始相信，美国恰恰在这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

这一信念在我辗转到达巴哈马群岛以后的日子里得到了证实。我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度假的地方，而不会给萨达特总统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这样的朋友造成更大的压力。我急于走自己的路。虽然我决定离开摩洛哥去访问巴哈马是仓促的，但进展相当顺利，至少最初是如此。为了巴哈马之行，哈桑国王好心地派一架飞机供我全家使用。当我们到达拿骚国际机场时，我的新任顾问们（我的好友纳尔逊·洛克菲勒原来的同事）早已把一切安排就绪。在与巴哈马政府的代表寒暄之后，我和我全家朝着准备送我们去“天堂岛”的三架直升飞机走去。我感到轻松愉快并充满信心。我们降落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停机坪已用几个白色的大型×标志。我们度假的住地是在一个舒适的包括旅馆、网球场和游泳池的海滨别墅。主人是“国际别墅”组织的主席。三间卧室的住房远非豪华，但足够我们使用。在进行了必不可少的拍照和与等候在那里的记者们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便进房休息了。

我们在巴哈马群岛的逗留并不轻松。我花去许多时间收听德黑兰广播电台令人沮丧的新闻。霍梅尼的革命法庭已经积极行动起来。每天都有有关我国新暴行的报道。行刑队在处

决我的朋友和同事。我的支持者的家庭遭到洗劫和抢掠，他们的银行存款遭到抢劫，汽车和私人财产被偷窃一空。几周之前处决长期担任我的首相，埃米尔·阿巴斯·胡维达使我陷入极度悲痛之中，霍梅尼的刽子手们已开始动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共和国每天都对我的政府成员及其家眷进行无缘无故的折磨和污辱，这些活生生的报道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有多么野蛮描绘得淋漓尽致。

当我出现在我的住宅外边的时候，我被游客们包围了。人们是友好的。许多人要求我签名并对我和我的家人表示支持。新闻界做了各种猜测性报道，后来就谣传说我打算买下这个群岛的股份。我的随从人员一直忙于否认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传言。

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在巴哈马的日子根本不是度假。

我在巴哈马与美国的接触极少。美国大使施瓦茨在我停留的最后几天才来看我。但是，我的随从人员却与大使馆的各种人进行了接触。通过各种渠道，我得知我的家庭任何时候在美国都是受欢迎的，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到那里进行治疗。然而，华盛顿渐渐对我去发出某些不安的信号。或许那种感情传染了巴哈马政府。那里的态度无懈可击但却是有距离的。我们的签证到期3周前，我的随从人员提出延长签证。官员们说他们将在一周内答复我们。申请提交到更高一级的官员，在签证到期前10天我们得知签证不能再延期了。我们必须在10天之内离开巴哈马！我们没有解释，没有表示遗憾，也没有同巴哈马官员进一步商谈。

现在我对他们态度的变化有了自己的看法。当初，对他们为什么要求我们离开仅仅是模糊地疑惑。虽然海滨娱乐场的

利润是巴哈马财政的主要依靠，但是如同在其它英国殖民地一样，英国在这块过去的领地上仍然有很大影响。长期以来，我对英国的意图和政策持怀疑态度，而且一直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这种态度。由于美国的疏远和冷漠以及英国一贯的不友好态度，巴哈马总理平德林要我离去，尽管我耗费巨资在那里逗留了10周。

在我们即将离开之前的两天，“国际别墅”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与我的一位助手马克·莫尔斯进行了接触，打听我是否继续呆在巴哈马是否有兴趣。这种变化多端的两面政策，我在流放中经常遇到。在伊朗的最后几个月它曾使我陷入困境，当天我根本不知道第二天美国的政策会是怎样，它的可靠性如何。

然而，眼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到哪里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确实得到了巴拿马的恳切邀请。巴拿马驻美国的前大使加布里埃·刘易斯到巴哈马来拜访过我，并邀请我去巴拿马。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我并不感兴趣。但是，我却派了我的儿子礼萨王储进行了访问。他会见了托里乔斯将军并在那里进行了短促的旅行，其中包括孔塔多拉岛，这个岛屿后来成为我居住的地方。

墨西哥在我自己选择的流放地点中名列前茅。我在位时，曾经访问过这个国家并很欣赏当地的风景，喜欢那里的人民，同时与当时的财政部长洛佩斯·波蒂略建立了友谊。于是我全力以赴地探索是否有可能在墨西哥找到一处避难所。我在美国的几位朋友给予了帮助。亨利·基辛格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进行了联系，包括卡特政府的官员在内的其他人也出了力。巴哈马签证期满两天前，我们接到访问墨西哥的邀请。为了安排住所助手们先行飞往那里，他们在奎尔纳瓦卡的一条不起眼的街上找到了一所住处，从那里到墨西

哥城乘车只需一个半小时。这是一所大房子，多年来没有人居住。房屋下边几百码有一条小河，座座葱翠的花园鳞次栉比，向河边倾斜，河对岸是一大片起伏的村庄伸向远方。虽然这个地方蚊虫成灾，但风景却十分秀丽。

6月10日^④，我们飞抵墨西哥，一列小型车队把我们从小机场护送到奎尔纳瓦卡。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为我们采取了许多必要的安全措施。不受干扰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我在巴哈马未能得到这种享受，在那里，我们成为众多人们感兴趣的中心，并经常受到人们的包围。那时，我的健康状况还算好，我所见到的人们是友好的，周围的气氛是轻松的。我拜会了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并且重新开始了平静的社会生活。现在，我有时间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思考最近伊朗事件的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并根据我国发生的一切重新清理我对自由世界未来的看法。

许多朋友来看望我，他们促进了这一工作。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来看望我，对此，我很感动，十分感激他们。他们两位都是我珍视的老朋友，他们的来访表明他们不仅仅仍然关心我本人，而重要的是关心我们长期协力解决的问题。我和他们两位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发现我们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仍旧一致，就象我们执政时，伊、美两国关系非常密切时期一样观点一致。

我与理查德·尼克松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53年，那时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他担任美国总统后，我们的关系不论是作为朋友还是盟友都得到了加强。在外交事务方面，尼克松总统对人对事有一种非凡的远见和理解。他从越南脱身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是出自理智、常识和深谋远虑。他对世界力量平衡的严谨概念毫无疑问提高了美

国的声望。

在他担任总统之前，我们曾在德黑兰讨论过许多有关地缘政治的问题，而且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一致。例如我们一致认为一国必须寻求同“天然盟友”联盟，这些盟友指的是依靠共同和长远利益保持结盟的国家。必须注意防止那些靠不住的、潜伏着麻烦的联盟。坚定可靠的盟友要比在关键时刻软下来的许多伙伴更有价值。理查德·尼克松就是这种盟友，他来奎尔纳瓦卡看望我表明了他对老朋友的忠诚。

我在几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了亨利·基辛格，最初他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随后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他是一位才艺高超的政治家，对美国和国际事务有着广阔的、非凡的见解。他一贯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始终深知美国维护体面的世界和平的责任，以此服务于国家。除高超的才智外，他还有两方面的品质：能够倾听他人的意见以及极为敏锐的幽默感。遗憾的是，世界上许许多多名人身上却缺少这种品质。

我们一致同意，作为一种变通办法以欧洲共产主义代替共产党在西方接管政权的神话已经开始消失。在法国，乔治·马歇与福朗西斯·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的伙伴关系已经有所疏远。我们对这一变化，并不感到意外。1977年底，我访问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论在华沙还是在布拉格，我都听到忧心忡忡的共产党官员们对法国左翼联盟可能在1978年3月法国议会选举中获胜表示关心。有人告诉我，没有比这更不可取的事了。共产党人几乎没有兴趣与其他人分享权力，他们希望控制一切。不论是诸如法国的马歇、意大利的贝林格和西班牙的卡里略等主张的联盟或者是联合，他们都不满意。只有葡萄牙的库尼亚尔毫不妥协的立场是可以接

受的。他曾差一点掌权，后来在竞选中又拒绝与人谈判。

共产党的不妥协态度在其它地方也可以看到。4万多名古巴雇佣军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到处煽动战争、叛乱和共产主义，他们开始了瓜分非洲的苦难历程。非洲是一个有前途的大陆，目前西方的工业极其需要它的原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料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越来越受到威胁。敌对的部落把自己说成是民族国家，它们把这块大陆搞得四分五裂；南部非洲已经深深地陷入冲突和种族战争之中。中国在工业方面仍然薄弱。日本不愿从她那巨大的新财富中拿出哪怕是一点点资金在自卫方面投资。东京仍然依靠美国的保护伞。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知道，那种保护伞是多么漏洞百出。

同时，伊朗正在不知不觉地陷入混乱。我曾领导跨入进步、强大和自信大门的国家处在分裂和血泊之中。一位衰弱而又狂热的老人正反复地对伊朗人民说他们是多么卑贱、痛苦和贫困。我曾煞费苦心建立在尊严和自尊基础上的妇女权利付诸东流碾成了中世纪的尘埃。我已经开始的许多工程项目无法完成而被弃之不用。毛拉们对我计划和建立的核反应堆能有什么兴趣呢？第一批建设中的两座反应堆将给伊朗的电力网增加2,500兆瓦的能力，它们座落在北部沙漠，将保证人们不受放射性废物的损害。中小学校、医院、大学、其它社会设施，以及还有我们正在兴建的工厂会怎么样呢？我曾计划把伊朗建成世界最大的化肥生产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枕黄粱！

在我们离开墨西哥到纽约去治疗的当天夜里，这些夙愿是那样强烈地折磨着我。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的海湾沿岸时，天已黄昏。飞机掠过半岛降落在劳德代尔堡飞机场上一

遗憾的是没有降落在真正的劳德代尔堡机场上。我的随从人员原来安排在公务机场着陆，而我们却飞抵该城市国际机场的公务喷气机场。待命在小型机场迎接我们的官员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穿过市区来接我们，而在我们等待的时候一位美国官员走上前来询问驾驶员我们是否打算倒垃圾，是否携带了植物。他原来是一个农业检查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等待的两小时期间，王后走下飞机在附近溜达。我感到疲劳，还有些发烧，又不知道在纽约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离开的消息在墨西哥已经泄漏出去了，墨西哥机场上有不少摄影记者。最后在佛罗里达办完手续，我们继续飞往纽约。午夜前我们到达拉瓜迪亚，飞机降落在机场偏僻的角落，远离其它飞机。那里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纽约的警察到处可见。一列小型车队停在柏油碎石路上。没有电视摄影机，真是谢天谢地。

到了纽约，我得到了宽慰，从此有了接受最好医疗的保障，到处都有人给我出主意。我们乘车出发了。起先，我打算在曼哈顿我妹妹的住所作短暂停留，与那里的人员见见面。当警方的无线电步话机报告说有一名摄影师正等候在住宅前时，我决定径直到纽约医院去。我被领进17层的两个房间，这儿的环境是熟悉的。大约30年前的1949年，我在访问杜鲁门总统期间，曾住进这家医院的这两个房间作定期的体格检查。

医疗小组以本杰明·基恩博士为首，他在墨西哥就为我作过检查并建议我来纽约。第二天上午，医疗小组为我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做了一系列的化验。大约24小时之后，于10月24日，我接受了外科手术。

手术后，我发表了病情公报，在公报中，我承认我的淋

巴癌已有6年的历史，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在这之前，我隐瞒了这个情况。最近，我已经发展到周期梗阻性黄疸——其原因还不能确定。两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亟待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分析。在纽约医院，我的内科医生们诊断黄疸是由于胆结石造成的。那天早上8点钟，我的胆囊和结石经手术摘除了。在我的胆道中也发现了结石，两周后施行了半手术性质的摘除。

手术两天后，我同家人一起庆祝了我60岁生日，我感到自己体力在恢复。全世界对我表露的友好情意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我的房间装扮得如同花店一般。最后，多余的花束不得不放在另一幢楼的候诊室里，我让人把这些花束分送给医院的其他病人，希望他们也同享花儿的美丽，使他们精神愉快。电话、信件和电报潮水般地涌进医院。成千上万的信件堆集着。许多是来自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向我祝福并提出给予帮助。我记得有一人写信给我，向我提供一所湖滨别墅“在那里你将会很安全”。提供类似这种帮助的人很多。有的人则劝我“安心地住在这个国家”。

美国公民对我表示的友好情意常常使我兴奋和激动。这与新闻报道和政府的政策真有天壤之别！当发生反对我的游行时，情形往往被夸大，而对于支持我的表示则予以驱散或漠然置之。我记得，1977年在我最后一次访问美国时，当时威廉斯堡大约有50人示威反对我，而500人则游行支持我。宣传工具却换掉了数字并夸张地问谁花钱雇用了国王的支持者上街游行，这时却没有人愿意出来回答我的问题：是谁雇来了反对国王的示威者？毫无疑问，他们是雇来的。因为，这不是伊朗人的示威。人群中掺杂着黑皮肤的面孔和亚麻色长头发的人，这在伊朗是少见的。

我在纽约住院期间，很少与美国当局接触。卡特总统从未打过电话或来过信，其他的美国高级官员也是如此。然而，当我恢复了体力的时候，川流不息的人们前来看望我。我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宣传工具这样热衷于报道少数反国王的示威者在医院附近游行再一次使我感到惊讶。与往常一样，他们对表示支持的情形很少注意：人们朝我的随从乘坐的小型飞机欢呼雀跃，飞机漂着写有“国王万岁！”的横幅在东河上空飞行。

11月4日，在我到达纽约两周之后，德黑兰好斗的狂热分子占领了美国大使馆，扣留了50多名人质。对于这种恶劣行为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据称他们是为了“惩罚”美国为我提供了一处以治病为名的庇护所。即使在今天，任何详细的评论都还不恰当。然而，这一事件对我本人的生活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虽然华盛顿仍然未与我直接联系，但是信号却明白无误。当局希望我在身体情况可能的条件下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对我来说，除非万不得已，我也不愿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

因此，11月8日我公开表示愿意离开美国以求释放被扣留的美国人质。然而，我的医生们的态度是：在这个时候，任何旅行对我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我一再申明，我与美国的友谊将不受损害，并指出，在我当政期间，在伊朗曾有45,000名美国人生活在“和平、安宁和繁荣”之中。

对我的申明最早做出反映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开罗。萨达特总统指示他驻美国大使阿希里夫·戈赫尔巴尔来医院请我回开罗进一步治疗。我确实深受感动，但是，我不愿意在那个时刻再一次使我的善意和慷慨的朋友承受压力。奎尔纳瓦卡的住所尽够我们用的。虽然我到墨西哥的签证12月9日就